

【产业经济】

# 企业家显现与产业集聚:金融市场的联结效应

张小蒂, 王永齐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产业集聚实为企业家集聚,而企业家为市场过程的产物,当劳动力在原有部门获得一定的知识积累使得成为企业家的收益超过其现有收益,其将会选择建立新企业,从而内生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规模。而新建企业势必涉及投资,如果投资额超过其自有财富,势必需要从金融市场融资,这时金融市场在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这一联结作用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家显现速度和产业集聚的水平。基于这样的产业集聚路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企业家不断显现所引致的内生产业集聚问题,并结合中国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理论的存在性,即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密度相对较高,产业集聚的规模和效果也将相对明显,这也正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诱因之一。

[关键词] 企业家显现; 金融市场; 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0)05-0059-09

产业集聚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的集聚,企业家形成在企业集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企业家不断显现所引致的产业集聚是企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形式之一。实证研究同样表明,产业集聚中的新企业出现大多都是从原有的部门中获得了大量知识外溢的人员建立起来的(硅谷就是典型的案例),获得新知识并建立新企业人员就成为知识外溢的载体,企业家精神就成为知识扩散和产业集聚的机制(王程,席酉民,2006;陈继明,2007),企业家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主体(张小蒂等,2008,2009)。

一旦考虑到企业家在一个地区内生显现对产业集聚效果的影响,势必涉及金融市场在企业家显现与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联结机制和重要作用,毕竟企业家显现的过程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机制的效果直接影响产业集聚的规模,而这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金融市场效率的地区不同表现引致的企业家形成机制差异。

## 一、金融市场在企业家显现与产业集聚中的联结效应

从现实的角度看,产业集聚的过程实际上是基于市场机会捕获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显现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10-04-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中我国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互动机理与对策研究”(批准号70873101);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批准号 REOD0901)和浙江工商大学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张小蒂(1951—),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齐(1976—),男,河南温县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激励,产业集聚实质上是企业家集聚,而企业家的形成是市场过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在于:当劳动力在现有的部门中通过培训或干中学获得的知识积累水平和个人适应市场能力值超过建立新企业对劳动力的能力要求时,如果成为企业家的净收益超过其现有的收益,其就会从现有部门中流出而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这时企业的数量将会上升,产业集聚便随之发生。显然,这样的产业集聚路径已经涉及企业家形成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而金融市场在这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其联结点在于:劳动力从原有部门流出成为企业家建立自己的企业,而新企业的建立势必涉及投资,当新建企业所需的投资额大于其自身拥有的财富总额时,就需要向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如果融资成本较低、从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的可能性越高以及获得资本规模没有政策性歧视约束,那么,劳动力选择建立新企业的可能性则越高,通过人员流动和企业家形成发生的内生产业集聚效果将更加显著,金融市场与企业家显现的关联程度将直接影响产业集聚规模和速度的大小。

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导致融资成本高昂,如资本市场不健全、利率非市场化、信贷规模约束、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等政策使得企业不得不向多家银行同时贷款乃至向民间资本借贷必然增加其贷款成本,降低企业的净收益,只有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家才能时新建企业的收益才可能超出其现有收益,边际企业家的收益只有高于其现有收益时成为企业家这一选择者才是最优的,也就意味着融资成本的上升提高了成为企业家所需的最低能力临界值,并降低了其知识积累的意愿,此时劳动力留在原有部门将是理性选择,只要其能力值满足现有需求即可,企业家由隐性转为显性的比率和分布密度也将随之下降。同时,由于企业家显现过程受到影响,导致资本的边际社会收益也将随之下降。

显然,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对于促进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激发了隐性企业家的知识积累意愿,也降低了成为企业家的能力临界值的最低要求。从现实的角度看,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同样拥有较高的企业家比重;反之,融资成本的上升提高了边际企业家的能力要求,这必然不利于企业家的形成,从而限制了企业家形成进而限制一个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依此逻辑,当融资成本使得成为显性企业家收益超出目前的收益水平并且知识积累达到成为企业家的临界值时,隐性企业家从现有部门流出并成立新的企业将使得隐性企业家转换为显性企业家,金融市场缺陷将限制新企业的产生进而限制产业集聚效应。而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与金融市场结合越紧密,企业发展越快(Asli, Vojislav, 1996),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将提高企业家的投资水平和创造力,信用体系的缺失将导致企业家创新动力的弱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Schumpeter, 1934)。

基于上述分析,给出本文命题: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显现的速度相应越快,同时该地区拥有较高的企业家密度,通过财富效应和示范效应,该地区的企业家会以更快的速度显现,从而导致本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得以扩张;反之,金融市场效率越低的地区,企业家显现的速度相应越慢,产业集聚的规模也将受到限制。

##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选择

本文就是判断企业家形成、金融市场与产业集聚的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并检验上述命题的存在性问题。为此,构建回归所需的相关指标,关键是企业家、产业集聚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指标。

(1)企业家(*enterpriser*),以每百人中私营企业家的数量表示。

(2)产业集聚(*cluster*),可以用下式加以描述:

$$cluster_i = \frac{1}{24} \sum_{j=1}^{24} X_{ij}, X_{ij} = \frac{i \text{ 地区 } j \text{ 行业工业总产值} / i \text{ 地区 } GDP}{\text{全国 } j \text{ 行业工业总产值} / \text{全国 } GDP} \cdot X_{ij}$$

实际上反映了*i*地区在*j*行业上的比较优势程度,如果该值大于1表示*i*地区在*j*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反映了*j*行业在*i*地区的集聚程度较高;反之,该值小于1表示*j*行业在*i*地区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cluster<sub>i</sub>*则表示*i*

地区所有行业的集聚程度的平均值,总体上反映了该地区的总体产业集聚度。在产业的划分上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方法将中国的工业产业划分为 39 大类,然后进行计算。

(3)如果以  $fin\text{inefficiency}$  表示金融市场效率指标,考虑到资本市场对于私营企业家的高门槛性,本文只考虑银行体系对于私营企业资本来源的重要作用,可用以下几个间接指标加以衡量:

银行体系资金流向私营企业及个人企业的比重( $private$ ):根据 King and Levine(1993)的观点,流向私有企业的资金增加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在上升,实际上提高了私有部门的资本可获得性并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融资成本。

银行体系的垄断程度( $fin\text{incompetete}$ ):一般而言,银行体系的垄断程度下降实际上意味着竞争程度的加强,这将有利于提高私有部门从银行体系获得资本的可能性,并且融资成本也会随着银行业竞争的加剧而降低。 $fin\text{incompetete}=1-\frac{\text{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年末贷款余额}}{\text{银行体系年末贷款余额}}$ 。 $fin\text{incompetete}$  指标的上升意味着传统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程度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竞争在加强。

资本边际产出( $m\text{product}$ ):一般而言,资本边际产出上升意味着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下降,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收益从而提高企业投资的意愿。如果以  $K_t$  表示一个地区在  $t$  期的资本存量, $GDP_t$  表示  $t$  期的总产出,那么,资本边际产出表示为: $m\text{product}=\frac{GDP_t-GDP_{t-1}}{K_t-K_{t-1}}$ 。

储蓄投资转化率( $sa\text{veinvest}$ ):以年末贷款余额除以存款余额加以表示,这一指标实际上反映了金融资本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高的储蓄率会增加信贷资金总量,进而导致投资增加,较高的投资率通过投资乘数作用,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作用。

### 三、变量选取、回归方法和结果分析

#### 1. 变量选取

为了验证金融市场是否促进企业家形成进而促进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这一机制是否存在,即  $fin\text{inefficiency} \rightarrow enterpriser \rightarrow cluster$  这样的机制是否存在,关键是要判断金融市场与企业家的联合作用是否促进了产业集聚,为此,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cluster_i = \alpha_0 + \alpha_1 fin\text{inefficiency}_i \times enterpriser_i + \alpha_3 X_i \quad (1)$$

$fin\text{inefficiency}_i \times enterpriser_i$  表示  $i$  地区企业家与融资效率指标的乘积,用来具体分析金融市场与企业家的联合作用是否对产业集聚产生作用,如果这一指标的系数为正则表明通过金融市场发生的企业家形成机制确实存在;系数为负则表明金融市场并没有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引致企业家形成进而强化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为了避免各金融市场效率指标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在检验过程中,每次用一个金融市场效率指标来替换  $fin\text{inefficiency}$ 。

$X_i$  表示影响产业集聚的其他指标,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以工业总产值除以劳动力人数表示;市场容量( $capacity$ ),以该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表示;吸引外资( $fdi$ );以当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表示;研发投入( $R\&D$ ),以三种专利批准数占全国比重表示。

#### 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为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为了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择了中国东中西部<sup>①</sup>20 个省份作为分析样本。

关于产业集聚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将产业划分为 39 个大类,考虑到市场过程中自发的

① 由于直辖市的特殊情况,在样本中暂不考虑一些城市。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东部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四川、陕西、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和新疆,共 20 个省份。

企业家形成引致产业集聚现象,将 39 个大类产业中属于垄断或垄断程度高的产业剔除<sup>①</sup>,保留 24 个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重新计算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集聚指数 *cluster*,数据来源:1991—2007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经济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 3. 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方法上采用中国东中西部 20 个代表性省份的面板数据,经过 F 检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详见表 1。

表 1 1990—2006 年金融市场对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产业集聚			
	<i>finefficiency</i> 的替代指标			
	<i>private</i>	<i>fincompetete</i>	<i>mproduct</i>	<i>saveinvest</i>
常数项	0.45(17.09)*	0.47(15.52)*	0.42(14.66)*	0.43(15.45)*
<i>finefficiency</i> $\times$ <i>enterpriser</i>	7.58(7.76)*	1.36(4.40)*	0.01(0.36)	0.56(3.87)*
<i>productivity</i>	-0.11(-7.57)*	-0.13(-6.10)*	-0.06(-3.41)*	-0.12(-5.68)*
<i>capacity</i>	8.12(8.00)*	8.24(7.69)*	8.23(7.43)*	9.30(8.33)*
<i>fdi</i>	2.72(8.29)*	2.64(7.65)*	2.58(7.26)*	2.32(6.55)*
<i>R&amp;D</i>	2.54(3.43)*	2.35(2.93)*	3.14(3.89)*	2.26(2.76)*
R <sup>2</sup>	0.71	0.67	0.65	0.66
F 值	159.94	136.40	125.31	133.86

注:括号内为 t 值,\*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检验显著。

从回归结果看,市场容量(*capacity*)、外资(*fdi*)、研发(*R&D*)的系数全部为正,表明这些变量对产业集聚产生正向影响,这与国内诸多学者的研究相一致,而生产率指标(*productivity*)为负,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依赖性并不明显,结合实际,中国劳动生产率在考虑到流动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的情况下整体水平并不高,中西部地区生产率省际差异不大(陶洪,戴昌钧,2007)。另一方面,回归结果同样证实了本文推论的存在性问题,即 *finefficiency* $\times$ *enterpriser* 的系数全部为正,表明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通过促进企业家不断显现的方式对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形成产生影响。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具体而言:

(1) 银行体系对私营经济部门的贷款比重增加将促进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private* $\times$ *enterpriser* 指标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银行体系对私营部门的贷款通过促进企业家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促进了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私营经济部门的贷款比重增加在促进企业家形成方面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银行体系增加对私营经济部门的贷款不仅增强了资本的可获得性,并通过促进企业形成的方式提高了单位资本的社会产出,即强化了银行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深度。

(2) 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上升有利于企业尤其是私有经济部门通过间接融资渠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而间接融资又是我国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势必激励企业家形成从而促进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fincompetete* $\times$ *enterpriser* 指标为正且显著,表明银行业垄断程度下降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从现实角度看,随着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集中程度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对于提高银行业的整体效率以及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

① 剔除 39 个大类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高了成为企业家的收益并激励一个地区企业家显现的速度和产业集聚规模。

(3) 储蓄投资转换率的上升对企业家形成进而对产业集聚产生推动作用,  $saveinvest \times enterpriser$  指标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国内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所造成的投资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不断得到提高, 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不断上升。这种转化效率的上升促进了私营经济部门从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量, 并且可促进一个地区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的效果,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大量贷款投入到国有部门, 理论上来讲该指标越大越不利于私人资本的成长。但另一方面, 根据卢峰等(2004)的研究, 部分贷款通过国有部门间接地转移到私人部门则证实了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这种资金“漏损效应”对私人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重要性。

(4) 资本边际产出的上升实际上反映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意味着资本将从低收益行业流向高收益行业, 促进了高收益行业的发展, 从而也提高了高收益行业中企业家的形成速度, 也有利于产业集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 $mproduct \times enterpriser$  指标系数为正表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 四、金融市场的联结效应与地区发展差距

上面的研究从整体上证实了金融市场在促进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过程中起到的重要联结作用。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而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与产业集聚的程度有着直接关系, 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基本共识认为: 产业集聚是导致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文玫, 2004; 范剑勇, 2006; 何雄浪, 李国平, 2007), 而企业家精神则是造成这一差异的诱因之一。

以 2005 年为例, 东部地区每百人口中私营企业数量为 1.01 个, 而中西部地区只有 0.20 个, 相对应的是, 东部产业集聚指数和人均 GDP 为 1.41 和 28717 元, 中西部地区为 0.45 和 11041 元。结合上述实证结果, 显然可以认为, 东部地区之所以在经济表现方面优于中西部地区,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规模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造成这样的诱因之一在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效率相对高于中西部地区, 从而导致东部地区企业家形成的速度和产业集聚规模优于中西部地区, 金融市场在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联结效应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深层次原因。通过表 2 的回归结果可以进一步对金融市场、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进行深入分析。

表 2 1990—2006 年不同区域比较分析

解释变量	东部 5 省				中西部 15 省			
	因变量: 产业集聚				因变量: 产业集聚			
	$finefficiency$ 的替代指标				$finefficiency$ 的替代指标			
	$private$	$fincompetete$	$mproduct$	$saveinvest$	$private$	$fincompetete$	$mproduct$	$saveinvest$
常数项	1.04 (13.12)*	1.18 (14.17)*	1.12 (13.55)*	1.17 (15.37)*	0.48 (15.62)*	0.52 (15.60)*	0.50 (15.98)*	0.50 (16.31)*
$finefficiency \times enterpriser$	4.49 (4.13)*	1.24 (2.84)*	0.26 (2.27)**	0.88 (4.54)*	-11.38 (-3.33)*	0.43 (0.97)	-0.03 (-1.04)	0.12 (0.63)
$perproduct$	-0.04 (-1.82)**	-0.09 (-2.09)**	-0.08 (-1.74)**	-0.12 (-3.36)*	-0.07 (-4.35)*	-0.12 (-5.81)*	-0.10 (-5.76)*	-0.12 (-5.61)*
$capacity$	2.57 (1.71)**	1.61 (1.03)	3.12 (1.83)**	2.66 (1.80)**	5.64 (4.27)*	4.50 (3.33)*	4.79 (3.62)*	4.87 (3.66)*
$fdi$	1.11 (1.90)**	0.86 (1.40)**	0.38 (0.65)	0.86 (1.56)**	2.23 (6.09)*	1.77 (4.81)*	1.87 (5.25)*	1.73 (4.17)*
$R\&D$	1.58 (1.74)**	1.32 (1.38)**	1.10 (1.11)	0.73 (0.80)	3.97 (3.52)*	4.35 (3.78)*	4.38 (3.80)*	4.28 (3.73)*
$R^2$	0.37	0.31	0.28	0.39	0.45	0.43	0.43	0.43
F 值	9.52	7.14	6.38	10.45	41.49	37.92	37.97	37.73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表示在 0.01、0.05 和 0.10 水平上检验显著。

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  $fin\text{inefficiency} \times \text{enterpriser}$  的系数全部为正,表明金融市场通过促进企业家不断形成的路径强化了本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而这一结果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得到全部验证,除了  $fin\text{incompetete} \times \text{fin}\text{inefficiency}$  和  $\text{saveinvest} \times \text{fin}\text{inefficiency}$  指标的系数为正外,其余全部为负,表明通过企业家显现引致的产业集聚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受到金融市场的约束相对明显,具体而言:

(1) 银行体系对私营经济部门的贷款比重增加对东部地区企业家形成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text{private} \times \text{enterpriser}$  指标系数对东部地区为正,而对中西部地区为负表明这种情况的存在。结合已往的研究,企业家形成比率增加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 0.54 个百分点(何予平,2006);金融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年龄平均比金融不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年轻五六岁;同样地,新企业占人口的比重在金融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高 3%(Guiso et al.,2002)。这些情况表明,金融市场越发达,效率越高将越有利于加速企业形成,这就意味着通过企业家形成发生的产业集聚越明显。这种结果同样现实地反映了中国沿海地区在经济表现方面优于内地的重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区拥有效率相对较高的金融市场以及由此引致较高的企业家形成频率。

当然,这种结果可能与东部各省本身私营经济发达有关,现实的情况在于,东部各省与中西部各省的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东部地区的银行体系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私有经济部门从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难度相对较大,势必影响企业家的形成。客观而言,西部中小企业发展落后存在诸多因素,融资困难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一份我国各区域样本省份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较东、中部地区更为突出(林汉川等,2003),这很可能也是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表 3 可以看出,2006 年东部地区对私营企业及个人贷款额远高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地区,中西部 15 省对私营企业及个人贷款额总额还要低于浙江省的总量。

表 3 2006 年代表性省份私营企业及个人工商户贷款与工业总产值相关情况

	江苏	浙江	山东	河南	辽宁	湖北	湖南	四川	中西部 15 省
私营企业及个人贷款额(亿元)	214.79	885.29	164.20	32.10	129.80	38.730	26.03	52.85	580.97
私营企业及个人贷款所占比重(%)	5.10	12.50	5.10	3.30	2.40	0.90	2.30	8.20	0.80
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	27.00	36.00	27.00	27.00	21.00	16.00	30.00	26.00	19.00

注:为了比较,本文选择东部地区省份为江苏、浙江和山东;中西部地区样本选择的对象为本区域 GDP 总量最大的省份,东北地区为辽宁,中部地区为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为四川。

资料来源:根据 2007 年相应各省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整理。

(2) 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上升对东部地区企业家形成的激励作用同样优于中西部地区,  $fin\text{incompetete} \times \text{enterpriser}$  指标系数对东部地区而言大于中西部地区表明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且中西部地区这指标的 t 检验同样没有通过。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银行业竞争不充分导致企业尤其是私有经济部门很难通过间接融资渠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而间接融资又是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势必限制企业家形成从而约束了中西部私营经济的发展。2006 年,浙江省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仅为 25%,而辽宁省的比重为 44%,河南省为 71%,湖北省为 43%,湖南省为 56%,四川省为 44%,表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结合林汉川等(2003)对不同省份的调查证实,个体私营企业除了 41.1%的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外,还有 1/4 的企业从非金融机构贷款。总体上看,企业所获贷款的期限普遍过短,贷款渠道比较单一,贷款额度偏小,贷款利率偏高,个私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贷款歧视,国有金融的制度性困境必然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主体经济之外。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从动态变化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垄断程度有所下降,但与东部地区银行业相比,其竞争程度仍然较为低下,银行业的竞争不充分进一步限制了私营企业获得贷

款的成本,不利于企业家的形成。

(3)储蓄投资转换率的上升对企业家形成进而对产业集聚产生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表明得更为显著。 $saveinvet \times enterpriser$ 的系数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而言均为正,表明国内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所造成的投资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不断得到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不断上升。这种转化效率的上升促进了私营经济部门从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量。这类情况同样促进了一个地区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的效果。但 $saveinvet \times enterpriser$ 系数的t检验并没有得到验证,表明储蓄投资转换率在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形成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这种情况与中西部地区银行竞争不充分有着直接关系。而银行间竞争不充分最直接的结果必然是降低储蓄投资转换率,并提高了银行体系内部整体的资金成本,对成本相对敏感的私营企业而言,必然限制其投资行为,进而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上述这些结论同样验证了本文的推论:如果说产业集聚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那么,金融市场在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联结作用的大小则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诱因之一;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同样拥有较高的企业家比重;融资成本的上升必然不利于企业家的形成,从而限制产业集聚的规模。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之所以低于东部地区进而导致其经济表现劣于东部地区,其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效率相对低下,而且一直以来,内陆省份的银行贷款以各种方式流向沿海省份,这更加剧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结果。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理论层面而言,通过企业家不断显现引致的产业集聚路径是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重要表现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一个地区的金融市场效率越高,企业家形成速度随之提高,企业家平均分布密度也将上升。这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高的地区通过企业家显现表现出来的产业集聚效果优于金融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

从实证结果看,代表中国不同区域省份的检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现实存在性。其基本结论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之所以在经济表现方面优于中西部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存在着效率相对较高的金融市场,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从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规模和比重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也提升了东部地区企业家的活跃程度,产业集聚的程度也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这正是被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的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企业家形成过程中的金融约束则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诱因。

基于这样的理解,那么,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和改善对经济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将货币转换为资本这样简单的路径。由于金融市场在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重要联结作用,其对经济的影响将被放大。因此,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就显得至关重要,具体而言:

(1)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尤其是促进股份制银行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要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其对私营企业的贷款比重重要远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这种结果与银行体系的竞争强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促进银行体系的竞争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融资效率并为企业发展提供多种形式的资金支持,从而提高私有经济部门获得资本的规模,进而促进企业形成并强化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效果。此外,还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满足多元化的投资及融资需求,从而提高金融体系各个层面的竞争程度和金融市场效率,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家由隐性转为显性这关键的一步提供金融支持。

(2)提高利率市场化程度,从而提高储蓄投资转换率。结合我国实际,储蓄向投资转换的效率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并不高,利率基本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它不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决定,而主要受货币政策导向影响,缺少市场供求生成的基础,因此,利率不能准确反映货币供求的变动,不能对储蓄与投资的均衡起到自动调节作用。另一方面,间接融资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而间



接融资渠道又主要控制在国有银行手中,所以,非国有经济在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建立新企业时很难顺利获得所需资金。相比之下,产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的“隐形契约关系”却可以从国有银行不断获得资金支持,因而严重扭曲了信贷结构(武剑,1999),降低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资本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开,依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间接投资或者从国际金融市场借贷等形式,中国资本流入大量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仍然实施着贷款规模约束等资本控制,这使得资本流动性偏弱。

(3)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使得资本由低效率的企业流向高效率的企业、由低效率的行业流向高效率的行业,从而提高私营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的可能性,总体而言,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并不理想,意味着我国中小企业无论是处于收益高还是收益低的行业中都面临着融资困境。金融市场应有的资本高效优化配置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信贷市场上,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低,在资金需求量旺盛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却存在着大量信贷资金的闲置,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在银行内部循环,这说明银行对于资金的配置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潘文卿和张伟(2003)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导致中国信贷市场与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尽管中国的金融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改革,已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信用社等多种金融机构,但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并未实质性打破,国有银行改革的相对滞后,不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配置效率。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种非国有银行类型的金融机构,使其在中国的信贷与投资市场上占有更大的规模,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这对于促进劳动力流动和企业家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4)促进金融市场均衡发展,尤其是加快资本市场和非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关键在于降低企业直接融资的门槛,逐步清除在资本市场上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排他性。另一方面,小企业贷款难是国际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采取了财政补贴、政策性贷款、信用补充等多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采取了建立担保体系、实行财政补贴等多种措施,特别是提出组建创业板市场。较长时间以来,由于组建创业板的呼声很高,导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准入制度不一致,深圳市场一度停止发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占全部企业的99%以上,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尽快组建创业板市场,特别是科技型的创业板市场,建立一个有差别的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分层次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实现股票市场均衡发展,从而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更为自由和灵活的资本来源,这对于潜在企业家同样是一种激励。

总的来看,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储蓄投资转换效率,这种效率的改进不仅对于提高金融市场本身是重要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在企业家形成和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联结作用放大了金融市场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宏观经济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 [参考文献]

- [1]Asli, D.,and M. Vojislav. Financial Constraints, Uses of Funds, and Firm Grow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1996.
- [2]Baptista, R. Do Innovations Diffuse Faster Within Geographical Clust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0,18(3).
- [3]Fujita, M., and P.Krugma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4,83(1).
- [4]Fujita, M., and J.F.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J].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6,10(4).
- [5]Gordon, R., and P. McCann. Industrial Clusters, Complexes, Agglomeration and/or Social Networks [J]. Urban Studies, 2000,37(3).
- [6]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Does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R]. NBER Working Paper



- 2002.
- [7]King, R., and R. Levine.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3).
- [8]Krugman, P., and J.Venabl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110(4).
- [9]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99(3).
- [10]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Duck-worth Press, 1957.
- [11]Paniccia, I. Industrial Districts: Evolu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in Italian Firm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
- [12]Rosenthal, S., and W. Strange. 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 Henderson, J.V., and Thisse, J.-F.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C]. Amsterdam:Elsevier,2004.
- [13]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 [14]Simmie, J., and J. Sennett. Innovative Clusters: Global or Local Linkages [J].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1999,170(1).
- [15]陈继明. 企业家网络与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基于传统产业领域的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07,(1).
- [16]范剑勇. 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 经济研究,2006,(11).
- [17]何雄浪,李国平. 专业化产业集聚、空间成本与区域工业化[J]. 经济学(季刊),2007,(4).
- [18]何予平.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 C-D 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2006,(7).
- [19]林汉川,夏敏仁,何杰,管鸿禧. 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3,(2).
- [20][英]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1]潘文卿,张伟. 中国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相关性研究[J]. 管理世界,2003,(8).
- [22]王程,席酉民. 企业家对产业集群演化发展的作用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 [23]文玫. 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集聚[J]. 经济研究,2004,(2).
- [24]武剑. 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 经济研究,1999,(11).
- [25]张小蒂,李晓钟. 转型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殊性及其成长特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8,(5).
- [26]张小蒂,赵榄. 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与地区居民富裕程度差异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9,(12).
- [27]卢峰,姚洋. 金融压抑下的法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J]. 中国社会科学,2004,(1).

## Entrepreneur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upling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ZHANG Xiao-di, WANG Yong-qi

(School of Economic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the gathering of entrepreneurs. When the labor force in the original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makes the benefits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than their current earnings, it will choose to establish new enterprises, and thus endogenize the siz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new company is bound to involve investment, if the investment exceeds its own wealth, which would inevitably take funding from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n financial marke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first theoretically expounded the industry gathering caused by entrepreneurs' formation, combined with China's 20 provinces panel data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theory, The area with higher of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rkets will have relatively higher entrepreneurs density and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ll also be relatively significant.

**Key Words:** entrepreneurs' formation; financial marke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责任编辑:李海舰〕